

三



故事演变中的 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

◎王丽娟 著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
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
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齊魯書社

三



故事演变中的
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

◎王丽娟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故事演变中的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 / 王丽娟
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9

ISBN 978-7-5333-1845-1

I. 三… II. 王… III. 《三国演义》研究 IV.
I207.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865 号

三国故事演变中的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

王丽娟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34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845-1

定价: 28.00 元



王丽娟 1977年生,湖北英山人。2001年毕业于湖北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小说、戏曲,在《文学遗产》、《明清小说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

本书由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基金资助出版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

——王丽娟《三国故事演变中的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序

追溯事物的源起和流变，这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人特别讲究推源以溯流，原始而察终，繇明本末之因，以通古今之变。如《周易·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十三经注疏》本《周易正义》卷八）《礼记·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六十）这种历史源流学的观念生动地体现出人们对世间万事万物寻根究底的溯源思维，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被广泛地运用。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明确标举“原始以表末”（卷十《序志》）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所以当追他追究每一种文体的流变时，就时时采用“鉴必穷源”（卷九《总术》）的方法，“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卷十《序志》）。

概括地说，历史源流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以某一历史现象为中心，搜罗广泛的文献资料，细致地考察该历史现象自身生成、发展、变迁的演化过程，并藉以探讨在此演化过程中各个环节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从而对这种历史现象进行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二是以某一历史现象为对象，细致比较描述该历史现象的不同历史文本

振叶以寻根，
观澜而溯源

之间的异同及其因缘关系与变迁轨迹,藉以寻觅由不同的历史文本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恒定因素和变异因素,从而对这种历史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如果我们将前者称为“溯源研究”的话,那么不妨将后者称为“寻根研究”。

关于“溯源研究”与“寻根研究”这两种不同层面的历史源流学研究,我们可以《三国志演义》故事源流的研究为例加以说明。

《三国志演义》叙写的汉末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群雄逐鹿、风舒云卷的动荡时期,本身就流传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后代又衍生出无穷无尽、丰富多彩的三国故事。从魏晋一直到现代,三国传说、三国说唱、三国戏曲、三国小说、三国影视等等,构成三国故事的各种文学艺术表现形态,可谓源远流而流长。

一般认为,三国故事历经千百年的传承变异,至元末明初《三国志演义》小说问世,堪称集大成者。因此,以《三国志演义》为中心,考察三国故事的源流,以梳理《三国志演义》的形成过程和流传演变,就成为20世纪以来三国故事源流研究的热点。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以胡适《三国志演义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发端,经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小说月报》20卷第10期,1929年)、孙楷第《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文史》1卷第2期,1934年)、傅惜华《“三国”故事与元明清三代之杂剧》(《中国文艺》1卷第1-3期,1939年)等研究,既确立了《三国志演义》是在前代三国故事基础上逐渐演化而成的历史源流学理论观点,更确立了以详尽的史料梳理《三国志演义》成书过程的史源考证研究方法。

此后,一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如刘靖之《关汉卿三国故

事杂剧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80)、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等论著,都基本上延续了这种历史源流学的理论观点和史源考证的研究方法,对《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进行了更为细致、更为广阔、也更为深入的研究。而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又进一步将成书研究、文本研究与传播研究三者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力图“探求三国题材由成书到传播漫长历程中各个环节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美学特质,透视其中凝聚的社会各阶层文化心理的传承性与变异性,进而从特定角度与侧面观照我们民族追求真善美的心灵史之演进历程,探索中国长篇小说演进的某些规律性东西”(《三国演义源流研究·前言》)。

因此,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的三国故事源流研究基本上是在“溯源研究”这一层面上展开的,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如何在细致深入的史料辨析基础上,进一步对三国故事源流演变进行宏观研究和整体研究?如何在三国故事演变研究中,有效地将文献考证和理论批评结合起来?如何开拓研究视野,进一步展开以三国故事的演变和传播为中心的文化研究?

我觉得,要突破20世纪以来形成的三国故事源流研究的传统格局,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另辟蹊径,转向“寻根研究”的层面。王丽娟博士完成于2004年初夏的博士论文《三国故事源流研

究》(现改为《三国故事演变中的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就采取了这样一种研究策略。

从魏晋时期到明清时期,三国故事由历史事实到正史叙事,再到传说,到诗文,到讲唱、戏曲、小说,无论是在市井民间的大众文化圈中流布,还是在贵族文人的精英文化圈中播散,都一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三国故事源远流长,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变异,各朝各代、各式各样的三国故事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三国志演义》只是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而已。因此,仅仅以《三国志演义》为中心,考察其成书过程与传播过程,显然不足以揭示三国故事所包含的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内蕴。我们完全可以从三国故事演变发展的历程着手,细致比较同一三国故事的不同历史文本之间的异同及其因缘关系与变迁轨迹,藉以寻觅由这些不同历史文本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恒定因素和变异因素,从而对这种民族精神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一句话,我们完全可以也很有必要对三国故事进行一番“寻根研究”,这种研究既不同于《三国志演义》的源流研究,也不同于《三国志演义》的文化考察,而是将源流研究与文化考察相结合,对三国故事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思考。王丽娟的博士论文就选择了这一独特的文化研究层面。

众所周知,三国故事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两条各自不同的发展演进线索,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同存并在。当然,这两条线索并非平行发展,两不相干,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正是由于千百年来文人情感与民众情感的共同倾注,三国故事才如此绵延不绝、多姿多彩,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然而,由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间叙事的线索或隐或现,或存或亡,所以往往未能引起研究者高度的重视。殊不知,除了

各种不同版本的《三国志演义》小说以外,还有另类的民间三国故事存在于世,讲述三国故事的平话、词话、弹词、宝卷等,这些生成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民间叙事文本,不仅是体现民众情感和想象的最佳载体,也是体现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异同的形象表征。

问题在于,在三国故事源流演变研究中,我们如何有效地区分文人叙事文本和民间叙事文本呢?这无疑“寻根研究”的理论基础,不能不首先加以明确的界定。王丽娟认为,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区分不能仅仅取决于叙事主体,也不能仅仅取决于写作文体,而应该主要取决于对具体文本的整体分析,以及对构成具体文本的诸多因素的整合。因此,她细致地比较了三国故事同一母题的嬗变文本,从其种种细小的相异之处着手,归纳出区别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八个参数指标,即:(一)思想观念(包括思想、立场、视角),(二)知识层面(包括视域、历史知识及常识、文字讹讹),(三)审美趣味(雅与俗),(四)语言修辞(语言风格、语言水平、修辞手法),(五)程式密度(低与高),(六)内容(叙事内涵、传说母题、荒诞与否),(七)情节安排(精与粗),(八)叙事手法(叙事态度、叙事技巧)。这八个参数指标是否得当,是否全面,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但是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就是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确有着各自不同的参数。人们根据这些参数数目的多寡与组合的方式,可以有效地鉴别文人叙事文本与民间叙事文本。

当然,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端赖于具体而微的文本分析。要考察三国故事嬗变背后文人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异同,必须也只能考察具体的叙事文本。因此,对文本细致深入的解读,便构成王丽娟博士论文的主干。该书以各种形态的三国故事文

学作品为主,同时参照历代的文人记载和民间传说,对三国故事的嬗变进行文化考察。由于该书分析的是纯粹的三国故事文本,所以在进行文化考察时,文本的形态、层次、时代等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本的形态关系到文体的文化功能,文本的层次涉及到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异同,而文本的时代则体现出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三者都不可忽视。

三国故事的文本是极为复杂的。以貂蝉“连环计”故事为例,在毛宗岗本《三国演义》之前,现存的相关文本就有《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息机子本无名氏《锦云堂美女连环记》杂剧、元曲选本《锦云堂暗定连环计》杂剧、《三国志通俗演义》、王济《连环记》传奇、《三国志玉玺传》弹词等。这几个文本虽然都呈现为书写文本形态,但却有着种种的差异:有的是来源于口头传统的文本,即民间口头说唱的粗拙记录,有的则是纯粹的书面文本,即文人学士的写作;有的是先有说唱表演,后有文本,有的是专为表演(包括说唱表演和舞台表演)而创作的文本,有的则是完全的案头之作(包括创作和改作);有的是有名有姓的作家作品,有的是无名氏的作品。文本面貌如此纷繁复杂,它们体现出的文化观念、审美趣味等等也显然同异纷呈,这一方面构成了王丽娟博士论文之所以能够经由这些文本的辨析进行三国故事文化考察的基点,另一方面也对王丽娟的分析综合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为在对同一故事的多种文本进行细致而微的比较分析中,既要关注不同文本之间各自不同的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参数指标,从而藉以揭示文人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紧张关系,也要关注同一文本之中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交错兼容,从而藉以审视文人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交叉与渗透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既要在同中见异,也要在异中见同,既有历时性的历史文化变迁的描述,也有共时性的传统文化要义的阐发,这才

能真正抉发出三国故事叙事文本中含蕴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恒定因素和变异因素,从而对这种民族精神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应该说,这种双向思维本身就充满着知识探索和智慧提升的无穷乐趣。

为了使三国故事源流演变研究更为细致也更为深入,王丽娟选择了专题研究的方法,以“连环计”故事和关羽人物作为个案,前者以故事为对象,后者以人物为焦点,这正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切入,探讨文人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异同、互动关系,进而思考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这两个个案的具体展开形态,读者诸君不难从该书的目录中寻绎,我就不拟赘言了。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丽娟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具体文本的细读入手,进而竭泽而渔地搜集并分析每一具体问题所涉及的文献资料,细致地梳理该问题的历史演变轨迹,再进而展开理论的思考和归纳,论析该问题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这一研究方法在三国故事源流演变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并为王丽娟博士近来和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在王丽娟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之际,作为王丽娟的博士生导师,我欣慰地看到王丽娟经由辛勤的劳作结织出了第一张鱼网,更欣慰地看到王丽娟仍然孜孜矻矻地结织着第二张、第三张……鱼网。中国的学术研究正是这样,在一代一代学者不懈的探索 and 追求中稳步发展着。

郭英德

2007年4月6日

目 录

序	郭英德(1)
绪 论	(1)
第一节 20 世纪三国故事源流演变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本节研究旨趣及构想	(20)
第三节 三国故事纵向演化两条脉络	(27)
第四节 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概念 界定及区分标准	(36)

上篇 貂蝉“连环计”故事专题

第一章 “连环计”故事的源流演变	(63)
第一节 故事来源及流变	(63)
第二节 故事备受欢迎之共同文化心理探析	(86)
第二章 “连环计”故事的文本分析	(98)
第一节 文本选择与说明	(98)
第二节 文本比较与分析	(119)
第三章 “连环计”故事演变之文化意蕴	(177)
第一节 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重合	(177)
第二节 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差异	(181)

下篇 关羽形象专题

第一章 关羽故事的嬗递	(213)
第一节 三国故事叙事文本之前的关羽 和关羽形象	(213)
第二节 元明叙事文本中的关羽故事	(238)
第三节 关羽故事的嬗递与关羽形象的塑造	(264)
第二章 关羽故事的不同叙写	(303)
第一节 桃园结义故事的不同叙写	(303)
第二节 辞曹归刘故事的不同叙写	(319)
第三节 特殊关羽故事的叙写与另类 关羽形象的塑造	(335)
第三章 关羽形象传承变异之文化意蕴	(347)
第一节 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重合	(347)
第二节 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差异	(348)
结语	(365)
附录一 关羽和曹操争色考	(371)
附录二 三国故事文本简目	(390)
参考文献	(394)
后记	(412)
补记	(414)

绪 论

第一节 20 世纪三国故事源流演变研究综述

自从有三国一段热热闹闹的历史,后代就衍生出无穷无尽的三国故事。三国传说、三国说唱、三国戏曲、三国小说等都是三国故事的具体表现形态。可以说,史书《三国志》及裴注和当时民间口传故事是后代各种形态三国故事的源,之后的三国传说、三国说唱、三国小说、三国戏曲则都是它的流。从魏晋一直到现代,三国故事源远流长,中间历经传承变异,而以《三国志演义》为集大成者。从小的方面来看,以小说《三国志演义》为中心,通过三国故事源流演变研究,可以深入了解《三国志演义》的形成史;从大的方面来看,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文本形态的三国故事的研究,可以考察三国故事的流传演变史。因此,三国故事不仅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道,而且也为《三国志演义》及民间文学的研究者所关注。本文在广泛搜集海内外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三国故事研究的百年历程作一回顾,总结其成绩与不足,并从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梳理和评述的主要是毛本《三国演义》之前的三国故事源流研究;对《三国志演义》来说,只涉及其成书过程和源流研究部分。

纵观 20 世纪三国故事源流演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 ~ 30 年代,为三国故事源流研究的开拓期;40 ~ 70 年代,为三国故事源流研究的缓慢发展期;80 ~ 90 年代,为三国故事源流研究的高潮期。

《三国志演义》的研究,在 20 世纪最初 10 年,沿袭传统的批评方法和观念,多作片言只语式的感悟评点,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可言。进入 20 年代,以胡适、鲁迅为首,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转型。与此相一致,三国故事的研究也是从 20 年代开始,以胡适、鲁迅为开端,经郑振铎、孙楷第,再到傅惜华,渐成上升之势。

胡适在写于 1922 年的《三国志演义序》^①中虽没有细加考辨《三国志演义》的源流,但他谈到了唐、宋、金、元的三国故事,并总结出《三国志演义》是从宋以来的“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而来的。随着元至治间新安虞氏所刊《三国志平话》的发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增订本)中以精辟之言论断《三国志平话》“粗具梗概”的性质。胡适和鲁迅都是以《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为中心来谈及小说之前的三国故事的,由于受材料的限制,没能进行充分的论证,但其中隐含的《三国志演义》是在前代各种三国故事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成的观点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接受,他们只不过在此基础上补充新材料,添枝加叶而已。1929 年,郑振铎发表《三国

^①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 283 ~ 290 页。

志演义的演化》^①一文,对《三国志平话》作了深入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三国故事研究的力作。在胡适和鲁迅的基础上,通过详尽的考察和细致的比较,郑氏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观点:《三国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底本,为骨架,依据史书增删点染而成。郑氏在鲁迅简略的“粗具梗概”的定性后,对《平话》作了更进一步的考察,创见颇多。但囿于材料的限制,文中关于《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和题材来源的分析,引起了后来的一些研究者的争议。

到了30年代,三国故事研究又呈现出不同于20年代的面貌:研究视角扩大,除了《平话》外,又增加了三国戏的研究;研究更为细致微观,从定性到定量,较为系统科学。1933年徐凌霄在《三国志·三国演义·三国戏》^②一文中,以漫谈的形式论及了《三国志演义》与其他形态的三国故事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还指出:《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相比失“真”,与其他形态的三国故事相比,失“趣”;三国传说、三国说唱、三国戏曲表现民众心理,三国史书表现正统史观。徐氏首次以独立的姿态看待《三国志演义》以外的三国故事并对三国故事进行整体观照,惜于片言只语,点到为止,但他这些零碎的思想火花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十分有益的启示。继郑振铎之后,孙楷第《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③一文对《三国志平话》进行了更进一步的

① 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载《小说月报》20卷第10期(1929年)。又载其《中国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上册,第155~222页。

② 徐凌霄:《三国志·三国演义·三国戏》,载《剧学月刊》2卷第5期(1933年)。

③ 孙楷第:《〈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载《文史》1卷第2期(1934年)。